

■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全球化背景下的核心价值观构建

□ 谢文都

任何文明都有其历史和传统，因而拥有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坚持自身价值，并使之发扬光大，乃是各文明的本分。但文明自身具有局限性，它需要其他文明作为对照物，来不断提高自觉意识、消除视角盲点，推动并深化各文明对自身核心价值的认识，从而导向一种和而不同、诸文明共存的和谐世界。

——《孔子与人类文明》

迫其实行政治改革，保障上述人权。推行普世价值观的过程，对于弱势文明的自我反省和其视角盲点的暴露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它要求“文明转型”，要求弱势文明国家附庸于他们的价值理念，并按照他们的愿望进行政治改革，这种要求往往是当地文明失却根基，甚至引发弱势文明国家的内乱，危害世界和平，对于国际政治关系来说是消极的。

一种文明是通过一系列权利、美德、规范、榜样、愿望等确定的价值来表达自己的，其中表达原始责任意识的价值，就称之为文明的核心价值

人权是人类生存的出发点。没有权利的人不可能进行任何判断选择，从而无法生存。但是，对于人类生存来说，个体并不是孤立的瞬间存在，而是在群体中走向未来的持续存在。因此，人的存在还涉及责任，包括每个人在进行生存选择时对自己未来的责任和对他人存在的责任。

就历史发展而言，文明的差异性来自于不同的责任意识。一种文明的原始责任意识之培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涉及生存环境、语言文化、自身努力等等。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因素就可以培养出一种责任意识。比如，对于一对双胞胎，母亲随意指定其中之一为长，另一为幼，将导致他们形成不同的责任意识以及不同的成长之路。一个文明的原始责任意识的出现也是这样的。而且，一种责任意识形成之后，人们就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之引导，从此出发关心周围事物，判断并处理人际关系，设计未来生活等等。因此，对于个人来说，不同的责任意识引导不同的生存方式；而对于一种文明来说，不同的原始责任意识会造就不同的文明性格。任何一种文明都具有某种独特的原始责任意识，并在它的驱动和引导下生存发展。文明的这种原始责任意识需要我们特别重视。进一步分析，责任意识是流动性的，它必须形式化而成为某种固定的价值，才能作为人的判断选择之根据。因此，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一种文明是通过一系列权利、美德、规范、榜样、愿望等确定的价值来表达自己的。其中，那些表达原始责任意识的价值，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核心价值。

简单地比较中西文明的核心价值，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原始责任意识的内在力量。中华文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就其起源而言，殷商之变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在何处？周公提出“以德配天命”的说法，把“德”和“天命”放在一起。从此，寻求天命，并实践自己所把握的天命就成了儒家的原始责任意识。这个意识使得儒家对诚、孝、信、尊这四种原始情感有深入体验，确立了“仁”（关心人的成长和人际关系），“义”（寻求合适的行为模式），“礼”（建立一种合适的交往模式和社会制度），“智”（在礼教中认识自己和认识社会），“信”（形成一种朋友之间的信任情感）作为礼教之基础，指导人们“修身养性”，培养人的责任意识。这种原始责任

意识，虽历经数千年风雨飘摇，却始终深深地驱动并主导着中国人的价值意识发展和政治制度变革方向。

作为对比，西方文明在古希腊哲学中表达了一种追求真理的深刻情结，并在基督教的恩典思路中形成了一种相信耶稣基督、在信心中接受真理给予的原始责任意识。信心是一种绝对的信任情感。就其界定而言，信心是要放弃自己的判断权，使自己成为一个接受者，接受真理的自我彰显。但是，人是在判断选择中进入生存的。判断依据人的意识结构中的观念体系。因此，在信心中所接受的真理必须转化为一种观念，才能成为判断根据。于是，信心依靠和理性判断之间的关系就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关注。信心中呈现的神对人的爱，在神的爱中感受到人的罪性，理性自主性要求自由精神，对神所造宇宙美妙结构之向往培养出来的科学精神，以及近代宗教改革激发对当权者的极端不信任情感(罪感的一种社会感受)所导向的契约精神等等，这些就成了当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

就现象而言，人在一种文明中生活，其判断选择都受到他已经接受的核心价值所左右。不过，核心价值是在一定原始责任意识中培养出来的。原始责任意识是基础性的。因此，人们必须反省并进入自身的原始责任意识。在他们的价值判断中，符合这种原始责任意识的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不可能追问作为文明基础的原始责任意识之合法性问题，因为它就是一切合法性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有两个推论。首先，在没有外来文明的影响下，一种文明的发展始终受其原始责任意识驱动而自我发展、自生自灭。而且，人们不可能对自身的原始责任意识进行反思和分析——很显然，他们没有反思的基础。人们是在一定的原始责任意识和价值观中观察世界的。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观察角度，考虑到一种文明的有限性，我们可以说，一种封闭的文明是无法认识并消除自己的视角盲点的。其次，我们也注意到，限制或破坏一种文明的原始责任意识，等于阉割或摧毁这种文明的存在。原始责任意识是一种文明借以生存的基础，丧失自己的原始责任意识，等于丧失自己的存在基础。

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文明对话可以帮助指出对方盲点，推动对方发展自己的原始责任意识，共同扩展视野，实现自我更新。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世界诸文明被结合为一个经济共同体，彼此受益。同时，诸文明在这个共同体中发生直接联系。在当今世界，文明的孤立发展已属罕见。随着诸文明之间的交往加深，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各自的核心价值，发生冲突。因此，如何使世界各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成为祝福，而非演变为外在冲突，危害各文明的生存，对于当今国际关系来说，乃是当务之急，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文明建立在一定的原始责任意识之上。不同

的责任意识给出不同的价值观，形成一定的视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种评判。受着自己的原始责任意识的制约，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视角盲点。比如，如果一件事在某种责任意识中被判断为毫无意义，那么，无论这件事在其他责任意识中被认为多么重要，在这个视角下，这件事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称之为视角盲点。

举例来说明这一情况。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完成了他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的研究之后，对于中国科技在近代西方科学出现之前就已经很发达这一印象深刻，感叹说：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冯友兰在回应这个问题时指出，原因在于中国人不关心对自然界的独立研究。我们看到，中国人虽然对自然界十分敬畏，但是，他们并不关心自然的内在结构。他们只关心那些和人的生存有直接关系的方面，如农历研究、风水说等就很发达。因此，科学精神没有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取向。对比之下，在西方文明中，希腊人追求认识自然界的冲动很早就出现了。虽然苏格拉底关于“善”的追求淡化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活动，然而，“善”的问题也包括了真理问题，即：什么是真正的善？基督教进入西方文明之后，人们在信心上指向了神创造的世界。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认识这个世界的内在结构就是认识神的旨意。于是在中世纪，自然科学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动向。求真情结和基督信仰的结合一直在鼓励科学研究，尽管伽利略的科学研究受到了当时天主教的压制，但他们之间不过是两种不同科学观之间的争执。而对于中国来说，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特别是五四运动提倡赛先生的驱动，才终于抹掉了中华文明在自然科学研究上的盲点，使得科学精神在中华文明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因此，文明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呈现自己的视角盲点，就好像自己的眼睛不可能看到自己的眼睛一样。消除视角盲点需要其他文明作为对照物。可以这样看，对于一个文明认为毫无意义的事，却在其他文明中被认为极为重要，那么，这一文明的价值观就难免受到冲击，即视角盲点被暴露。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文明对话可以帮助指出对方盲点，推动对方发展自己的原始责任意识，共同扩展视野，实现自我更新。对于弱势文明来说，它需要对自己的原始责任意识有深刻的反省和清楚的认识，需要在与其他强势文明的对照下认识并消除自己的视角盲点；对于强势文明来说，它同样需要其他文明来映照自己的视角盲点，深化自己的原始责任意识。任何文明，只有在互信的气氛中和其他文明进行直接接触和交流，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我们称这样的文明对话为“核心价值文明自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我们要从诸文明的自觉意识出发来面对文明冲突问题，即：建立文明对话平台，突出各文明的平等尊严，彼此帮助消除对方的视角盲点，推动并深化各文明对自身核心价值的认识，导向一种和而不同、诸文明共存的和谐世界。

任何文明都有其历史和传统，因而拥有自身的核心价值。坚持自身价值，并使之发扬光大，乃是各文明的本分。文明发展有历史长短和发展方向的差异，抹杀这种差异，等于摧毁弱势文明。我们也注意到，受到自身的视角限制，任何文明，都有其视角盲点，文明对话恰好提供了一个暴露其视角盲点的平台。盲点暴露对一个文明的存在和发展来说当然会形成巨大的冲击，但是，它不会破坏文明的核心价值。文明对话的目的正是要推进各文明对自身核心价值的自我意识，使之发扬光大。

（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 论点集萃

国家治理的“两个眼”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十八届中央委员叶小文发表文章指出，习总书记2月17日讲话向世界释放重要信号：一要在坚定我们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二要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坚守价值体系。

这是运筹帷幄、统揽全局，下好下活实现中国现代化、保持和发展中国制度优越性这盘大棋的两个关键的“眼”。
一个“眼”：在坚定我们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中国人唱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好》。为什么好？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二是“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这两条要切实做到，一如既往，就要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另一个“眼”：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坚守价值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也是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精神资源。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



知行合一：群众路线的实现逻辑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于洪生认为，在新形势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知与行不可偏废，要达到知行合一，这是群众路线实现的基本逻辑。

从哲学的角度说，知与行之间是辩证的关系，“知”侧重从理论上解释某物是什么或者某事为什么需要这样做而不能那样做。“行”则强调自己的行为是否与所信仰的知识相契合。知与行有时是脱节的，比如，有的党员干部知道应该重视群众工作，认识到党群关系对于执政党的重要性，但却不去履行。现实中，人人都知道应该努力上进，要有毅力，可事实上真正能做到的人很少。人人都知道贪污腐败收受贿赂是不对的，是有风险也有违道德的，为什么还有许多人去做？解释说明此类现象，还需深究“知”与“行”复杂的内涵关系。“知”有“真知”与“假知”之分，“知”不仅是“知道有那么回事儿”，也不仅限于知道对错，而是要“真知”才行。成功之人，知行合一往往能到达很高的境界。境界不高的人，贪婪算计的人，没有能成就大事的，追求知行合一，才能境界高，胸襟宽，可以广纳贤才，收获人心，成就伟业。

建立一种中性的税收体系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基础来说，政府的财政体制必须要服务于市场。政府财政是个大概念，过去我们讲财政从形式上来说是政府对所有经济活动的资金计划以及对计划的执行，如果把市场定位为决定性作用，政府财政在很多领域就要重新定位。比如，对税的问题就要重新定位，即建立一种什么类型的税收体系问题。

现在欧美一些发达经济体中，直接税体系调整与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降低边际税率。由于直接税主要针对个人所得课税，对企业所得课税，降低直接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实际上意味着减轻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税收负担，使他们能够在市场上更好地发挥作用，进而增强市场的经济活力——这也应当是未来中国直接税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另外，还需要思考怎么解决间接税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问题。目前我国间接税的最主要税种就是增值税，我国已经从上海开始搞“营改增”试点，试点的产业包括现代服务业等。目前“营改增”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还存在着增值税税率档次过多的问题，如果增值税税率档次过多，税基和税目设计过于繁杂，也会对市场经济行为产生扭曲性影响，存在不公平的问题。为此需要构建尽可能中性的税收体系——这不仅是政府实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前提条件，而且也是财政科学领域的一个“梦想”，要使这个梦想变成现实，就要求财政学界不仅要对现行的政策进行研究，更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科学地证明建立具有一种中性特征的税收体系的可能性和实现途径。

□ 责任编辑 马清伟

儒学能为新一轮改革贡献什么？

□ 姜志勇

中国开启的新一轮改革是全面改革，涉及方方面面，这其中有关改革决议中明确列出来了的改革目标，也有隐藏在这些改革目标背后需要准备、夯实的内在功夫。对于新一轮改革来说，儒学能在改革的内在功夫和具体目标实现方面提供助力。更为重要的是，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最大贡献应是通过自身发展推动传统文化复兴，进而推动民族复兴，而民族复兴正是改革的最大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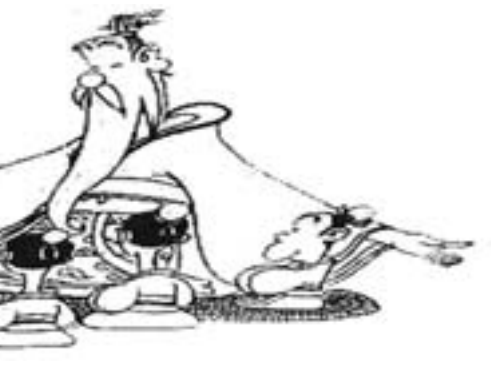
就夯实改革内功来看，儒学的作用主要包括：凝聚改革共识。包括知识界共识和大众共识。在中国知识界，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外，民间还存在多种价值或主义，包括自由主义、权威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这些主义间相互有冲突，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设计不尽相同，中国要凝聚改革共识就须把这些不同的主义信奉者凝聚到同一面旗下。传统文化无疑是最好的资源。在大众共识方面，虽然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传统因素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淡，但毫无疑问的是，至今为止社会大众最熟悉、感到最亲切的还是传统的东西。

提升改革成效。这一轮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系是制度，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通过制度的改进和变革，实现制度的现代化。能力是运用制度的能力，在新制度建立后，需要一批信奉新制度并熟练掌握、运用新制度的官员，因此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指官员队伍的现代化。也就是说，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新制度和培养新官员，通过建立新



制度和培养新官员来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但要达成这一目标，光有新制度和新官员是不够的，还得有接受、信奉、敬畏新制度的社会大众，如果社会大众不接受、信奉、敬畏新制度，经常采取违规甚至对抗行为，新制度将很难正常运转，新官员也将疲于应对。从这个角度来看，要确保、提升改革成效应“新民”，即培养具有新观念、新道德的社会大众，改革之后的国家应是“旧邦新民”的国家。儒家中有大量革新制度和塑造“新民”的资源。习总书记视察孔府时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要通过改革激发人们的道德意愿和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即自觉遵守、践行制度的能力。

形塑改革者。改革中，改革者的角色至为关键和重要。对改革者来说，要顺利推行改革，实现



改革目标，除应具有足够权威外，还要有坚定的改革意志，不畏强权的改革品质和一往无前的改革精神，甚至要随时做好为改革牺牲的准备。这样的改革者就是儒家所说的“志士仁人”，改革者就应是志士仁人，只有具备“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改革者才能不畏艰险，才能一往无前。培养这样的改革者，儒学的资源是丰富的，儒家历史上的改革家大多具有这样的品质和精神。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了大量的既得利益者和利益集团，中国近年有些改革之所以成效不显，和利益集团的阻扰有关，也和改革者是否具有“志士仁人”的精神有关。新一轮的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选拔一批认同改革、信奉改革的人，让他们做改革的执行者、推动者和坚守者；更要让社会大众切实享受改革成果，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改革的受益者，通过增大改革的受益者

进而造就更多的改革支持者和守护者，造就更多愿意为改革作出牺牲的人。

新一轮改革主要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保和党建等六大方面，每个方面又包括若干子目标，对于其中的一些改革目标，儒学能贡献自身资源。在社会治理上，传统儒家的乡村自治、家族自治传统能提供启示。相对今天来说，传统社会政府官员在社会大众中的比例并不高，但却能维持社会的良好运转和稳定，也能较好解决社会矛盾，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和借鉴。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资源儒家也是很多的。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儒家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山水草木和人一样都富有生命和灵性，不能随意破坏。

中国新一轮改革是为实现民族复兴梦想而进行的，然而民族复兴的条件，除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外，还需要文化复兴，没有强大文化软实力的国家不能称为真正大国。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他们也愿意称呼中国为儒教国家、儒家中国，儒家文化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因此，中国软实力建设、中华文化复兴离不开儒学，甚至可以讲，没有儒学的复兴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化复兴。

儒学在为改革贡献资源的同时，改革也能促进儒学的发展。事实上，文化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的衰落必然预示着民族的衰落，相反，文化的兴盛也必然会助力民族的强盛。

（根据作者的“儒学与当前改革”演讲整理，有删减）